

滇池地区汉代釭饰研究^{*}

陈亮吉（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

摘要：“策”作为汉代滇池地区所出车马器中常见的一类器物，以铜制为主，兼有少量玉制、铁制。因其名易与马鞭等它类器物相混淆，故为明确该类器物马饰带扣的功用，结合文献学分析将之重新定名为“釭”；同时对该地区所出考古学材料展开详细梳理，以前后两期釭饰形制演变类型学研究为基础，与其他地区同类器相较，探讨各型式釭传入的源流及在本地改进。最终结合各期釭饰出土情境分析，以该类器物的兴替简要阐释两汉时期滇池地区汉文化“羁縻类型”的形成模式。

关键词：釭饰；汉代；汉文化“羁縻类型”

Abstract: *Ce* is one of the commonly unearthed horse-drawn vehicle fittings of the Western and Eastern Han Dynasties in the Dianchi Lake Area. They were mainly made of copper with a few made of jade as a symbol of the nobility or iron by advanced craftsmanship in a later period. As *Ce* can be easily confused with other artifacts like horsewhips in horse-drawn vehicle fittings because of its name, this paper renames it *Jue* 釭 and identifies its unique function as a horse belt buckle fitting after careful consultation in and textual research on philological materials. In the meantime, a detailed summary of artifacts unearthed from the Dianchi Lake area in the Western and Eastern Han Dynasties is presented and a comparison with similar artifacts from other areas is conducted based on typological research of the evolution of *Jue* (horse belt buckle) forms between the two periods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origin of various *Jue* and their local improvements. In the end, an analysis is carried out on the situations of excavation based on unearthed *Jue* from different periods, by comparing *Jue* from the two periods and horse-drawn vehicle fittings unearthed together, which are different in types and features of artifacts, and tracing the evolution of *Jue* from a large quantity of artifacts unearthed with obvious local features showing great popularity to rare artifacts tending to be similar in craftsmanship to those in the Central Plains, so as to briefly discuss how the Western and Eastern Han Dynasties ruled the Dianchi Lake area with "loose reins" and thus interpret the formation pattern of the "loose reins system" (*jimi leixing*, 羁縻类型) in the Han culture of the Dianchi Lake area during the two Dynasties.

Key Words: Ornament *Jue*, Western and Eastern Han Dynasties, The "loose reins system" in the Han culture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的考古学研究”（项目批准号：LSYZD21018）。

一 “髹”名考

“策”作为滇池地区汉代墓葬中常见的车马器，对其最早的命名可见于郭宝钧系马饰物的研究之中，郭氏在文中将马饰肚带结合处的横方形生有勾舌的物件始称为“方策”^[1]，云贵高原地区报告中以“策”“策子”指称此类器物，显系沿用郭氏的定名。应该明确的是，从训诂学的角度看“策”的本义仅为头上带有尖刺的马鞭。《说文·竹部》：“策，马箠也。从竹束声。”^[2]《礼记·曲礼上》：“乘路马，必朝服，载鞭策，不敢授绥。”^[3]《考工记·辘人》：“輶前十尺，而策半之。”^[4]《庄子·马蹄》：“前有楸饰之患，而后有鞭策之威。”成玄英疏：“带皮曰鞭，无皮曰策，俱是马杖也。”^[5]这与报告中“策”所代表的器物形制、功用大相径庭。

经考证，“策”之古名应为“髹”^[6]，“髹”也作“鐻”。《说文·角部》：“髹，环之有舌者。”^[7]先秦即已见诸《诗经·秦风·小戎》：“龙盾之合，鍤以髹鞅。”^[8]《尔雅·释器》：“环谓之捐，鍤谓之鞅，载辔谓之鞅，辔首谓之革。”^[9]“捐”，《说文解字注》：“捐者，髹之假借字。《诗》容有作捐者。《通俗文》曰：‘缺环曰鐻。’许与服不同，服谓如玦，许谓环中有横者以固系。”^[10]

《说文·角部》：“鐻，髹或从金、喬。”^[11]《庄子·胠篋》：“将为胠篋、探囊、发匮之盗，而为守备，则必摄緘滕，固扃鐻，此世俗之所谓知也。”^[12]《后汉书·舆服志》：“紫绶以上，緹绶之间得施玉环鐻云。”^[13]可见，“髹”专指用以系固的扣饰，最早当用于维系马具，而随时代更迭，“髹”也由最早专指马饰带扣之称衍生为泛指环状带舌用以系结的器物，见诸于文献中。正印证了王国维“带具之名皆取诸马鞍具”^[14]之观点。

由此，笔者以为滇池地区报告中将此类器以“策”“策子”之名代“髹”，究其缘由，当是对郭宝钧“方策”这一命名的沿用，以及用此命名来区分考古出土的马饰带扣与衣饰带扣。为进一步探究之便，后文皆以其古名“髹”指代此类器物。

二 髹饰形制研究

就现有考古材料而言，云贵高原地区汉代墓葬共出土髹饰66件^[15]，其中铜制64件，玉制、铁制各1件。主要集中在出土于滇池地区的大、中型墓葬中，出土地点有云南江川李家山^[16]、晋宁石寨山^[17]、晋宁金沙山^[18]、昆明羊甫头^[19]、曲靖八塔台^[20]，此外，赫章可乐墓地^[21]等也有零星出土。现将65件可辨器型者统计如下（表一）。

该类器一般通长2.4~9.7、宽1.9~10.5厘米，

表一 滇池地区汉代墓葬出土髹饰统计表

出土地点	数量	器物编号	资料来源
晋宁石寨山	16	M3 : 74 (2)、M3 : 76、M6 : 28 (5)、M6 : 127、M7 : 81 (2)、M6 : 28、M6 : 127、M7 : 85 (2)、M13 : 139	《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
	1	M40 : 20	《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第四次发掘简报》
	4	M71 : 5、M71 : 7、M71 : 13、M71 : 203	《晋宁石寨山——第五次发掘报告》
江川李家山	8	M3 : 36、M3 : 43、M3 : 60、M27 (3)、M1 (2)	《云南江川李家山古墓群发掘报告》
	32	M47 : 20、M47 : 231-1、M47 : 231-2、M47 : 231-3、M47 : 231-4、M50 : 41-6、M50 : 44、M50 : 46 (2)、M50 : 49 (2)、M50 : 59、M51 : 24、M51 : 32、M51 : 37、M51 : 38、M51 : 277-1、M51 : 277-2、M53 : 16 (2)、M57 : 133、M57 : 148、M57 : 218-1①、M57 : 218-1② (2)、M68 : 320、M76 : 4、M85 : 92-2、M85 : 9、M85 : 69 (3)	《江川李家山——第二次发掘报告》
晋宁金沙山	1	JS : 126	《晋宁县金沙山古墓地清理简报》
昆明羊甫头	1	M157 : 36	《昆明羊甫头墓地》
曲靖八塔台	2	M1 : 6、M69 : 29	《曲靖八塔台与横大路》

多为铜制，兼有少量玉制和铁制。大体而言，其器身主要包括扣环、扣舌以及扣环上的扣孔。扣环形制多呈扁圆形、方形、长方形、马蹄形。扣舌主要呈长条状，部分舌尖形制为蛇头形。或为死舌，固定于扣环一侧；或为活舌，安置于扣环中间的横轴上或套铸于扣环一侧，可自由转动。扣孔有单孔、双孔之分，单孔一般用于穿带，双孔除一孔用于穿带外，另一孔用以固定带头。

依据扣环的平面形状可将其分为三型，并在同一型中根据扣舌与扣环的联结方式、扣孔数量划分亚型与式。

A型 3件。扣环呈扁圆形。据扣舌与扣环的联结方式与扣孔数量可分为二亚型。

Aa型 1件。死舌，单孔。扣舌固定在扣环外侧，舌尖向外。江川李家山M47：20，玉制。深米黄色。半圆顶突出一齿，框两端琢卷云纹。通长4.8、宽4.2厘米（图一：9）。

Ab型 2件。活舌，双孔。扣环中部有一横梁，梁中部有两个对称半圆形桩，桩上有小孔，扣舌尾端以铁轴横穿桩孔与齿环铆固。标本江川李家山M57：148，框长4.6、宽5.2厘米（图一：4）。

B型 41件。扣环呈方形或长方形。据扣孔数量可分为二亚型。

Ba型 40件。单孔。据扣舌与扣环的联结方式分为二式。

I式 3件。死舌，扣舌固定在扣环外侧，舌尖向外。标本江川李家山M53：16，框断面作圆角扁方形。框长4.2、宽3.4厘米（图一：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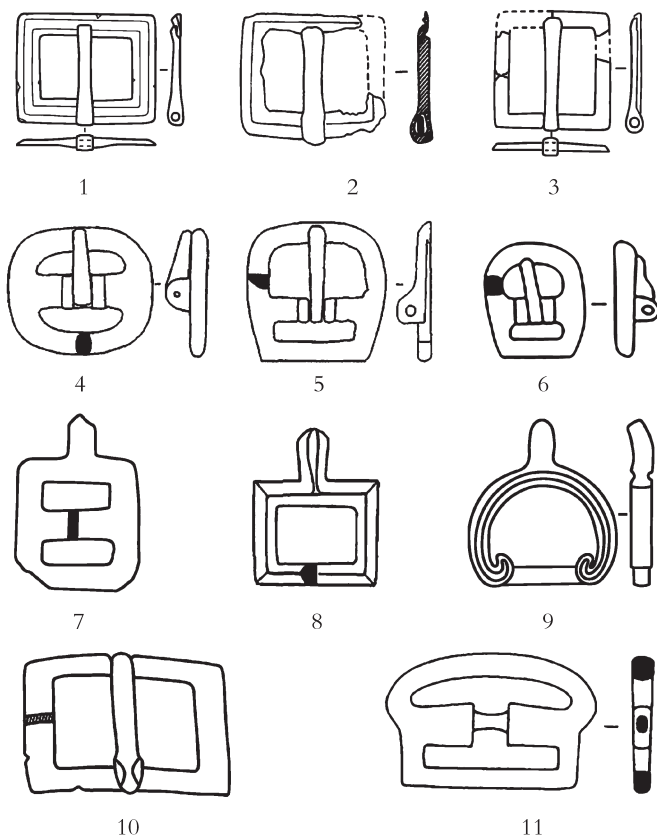
II式 37件。活舌，扣环一侧中央呈细轴，扣舌套铸在轴上，横跨扣孔至扣环另一侧。标本晋宁石寨山M71：203，铜质鎏金。中有一横扣舌。长8、宽7.8厘米（图一：3）。标本晋宁石寨山M71：7，长8、宽6.2厘米（图一：1）。标本晋宁金沙山JS：126，较残碎，仅保留大致形制（图一：2）。标本晋宁石寨山M7：85，框上中

央微凹，正中直装一蛇头形齿，可插入革带穿孔之内。框长7.5、宽8.5厘米（图一：10）。标本江川李家山M3：36，正中横装一齿，齿作蛇头形。长7.4、宽8.2厘米。

Bb型 1件。双孔。死舌，扣舌固定在扣环外侧。江川李家山M3：43，长4.3、宽4.1厘米（图一：7）。

C型 21件。扣环呈马蹄形，前圆后方，前宽后窄。活舌，双孔。据扣舌与扣环的联结方式分为两亚型。

Ca型 19件。扣环中部有一横梁，梁中部



图一 滇池地区汉代墓葬出土釳饰型式

1~3、10.Ba型II式（晋宁石寨山M71：7、晋宁金沙山JS：126、晋宁石寨山M71：203、晋宁石寨山M7：85）4.Ab型（江川李家山M57：148）5、6.Ca型（江川李家山M50：44、江川李家山M85：9）7.Bb型（江川李家山M3：43）8.Ba型I式（江川李家山M53：16）9.Aa型（江川李家山M47：20）11.Cb型（曲靖八塔台M1：6）

（1、3均采自《晋宁石寨山——第五次发掘报告》，第87页；2采自《大理丛书·考古文物篇（卷四）》，第1505页；4~6、8、9分别采自《江川李家山——第二次发掘报告》，第150、150、150、212页；7采自《考古学报》1975年第2期，第136页；10采自《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图版九五；11采自《曲靖八塔台与横大路》，第104页）

有两个对称半圆形桩，桩上有小孔，扣舌尾端以铁轴横穿桩孔与齿环铆固。标本江川李家山M85：9，表面鎏金，器形较小。框长2.5、宽2.1厘米（图一：6）。标本江川李家山M50：44，框长5.4、宽5.1厘米（图一：5）。

Cb型 2件。扣环中部有一横梁，梁中部有一中轴，扣舌套铸在中轴上。标本曲靖八塔台M1：6，扣舌残损。长5.8、宽3.7厘米（图一：11）。

三 舰饰分期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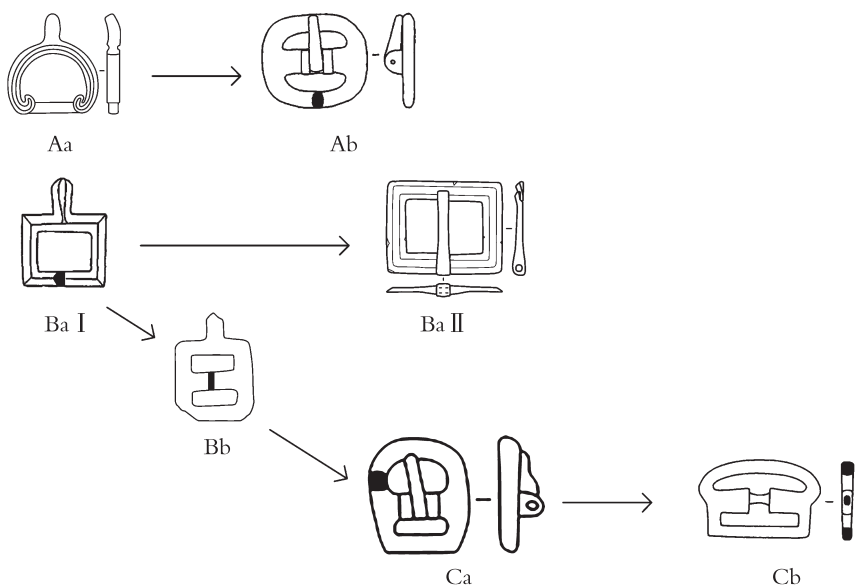
根据前文类型学研究可知，滇池地区所出舰饰的形制发展主要体现在扣环外形及扣舌与扣环联结方式的变化上，即扣环由早期较为简单的单孔方形、扁圆形发展至更为精巧的双孔方形与马蹄形；扣舌由死舌变为活舌，活舌可再分成从中部横梁处穿孔铆固与中轴套铸两个阶段。在此基础上，可将舰饰形制演变细分为三期六段。第一期早段扣舌为单孔死舌，扣身呈扁圆形或方形，主要器型为Aa型、Ba型Ⅰ式；第一期晚段扣舌为双孔死舌，扣身呈方形，主要器型为Bb型；第二期早段扣舌为活舌，与扣身的联结方式为穿孔铆固，扣身呈扁圆形，主要器型为Ab型；第二期晚段扣身开始出现马蹄形，主要器型为Ca型；第三期早段扣舌为活舌，与扣身的联结方式为中轴套铸，扣身呈方形，主要器型为Ba型Ⅱ式；第三期晚段，扣身呈马蹄形，主要器型为Cb型（图二）。

由于目前滇池地区发掘出土舰饰的墓葬年代均处于西汉中期至东汉初期，且大多具有较明确的层位关系，其内有铜器或铁器与之共存，故本文对各期舰饰年代的判断在依据发掘报告既有认识的基础上，再结合其器型变化及与之共出的年代较明确的器物，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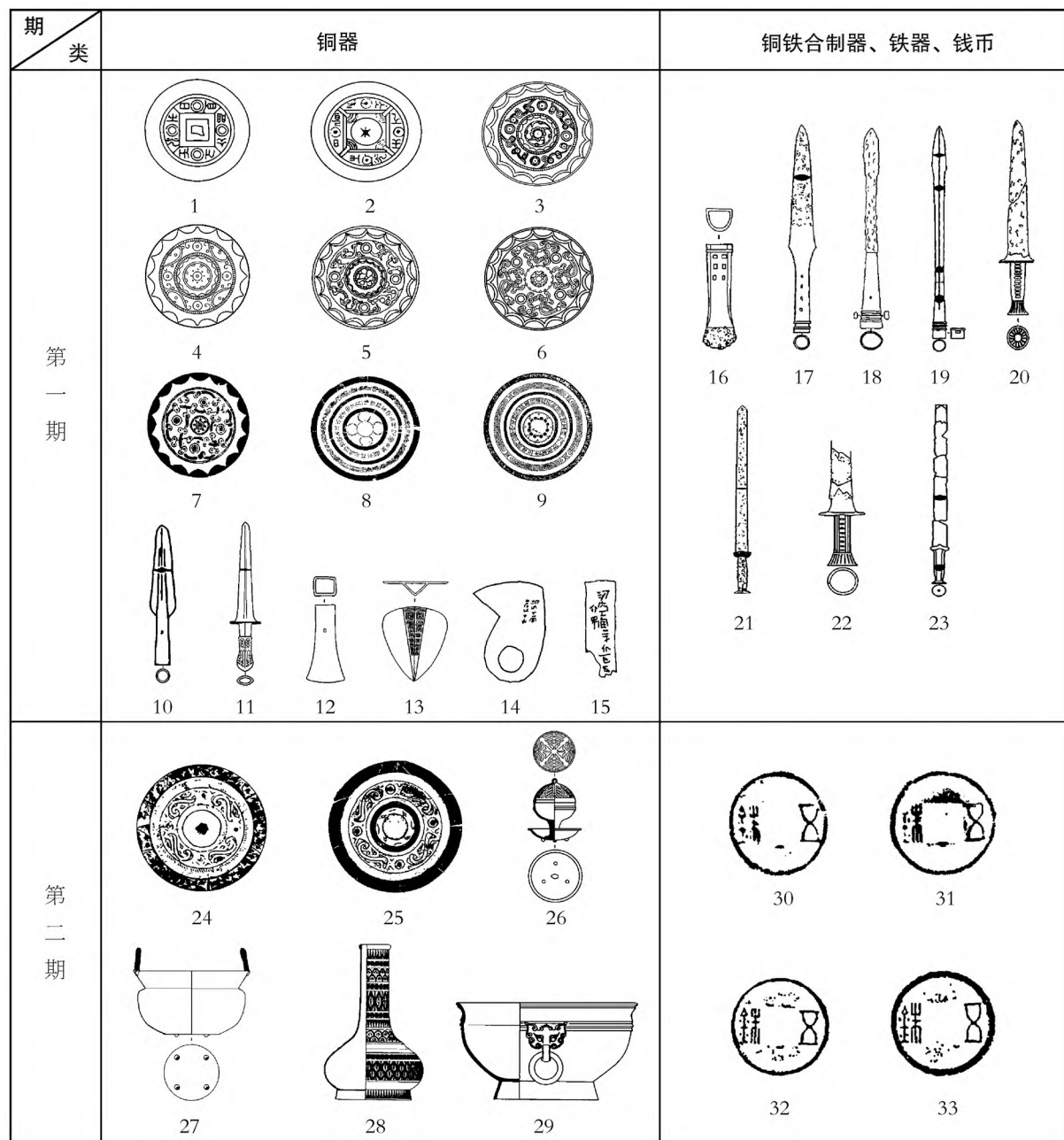
第一期早段至第三期早段为前期，年代约在西汉中晚期，本时期是滇池地区舰饰的主要流行时期，数量众多，形制多样，且多与整套车马器共出。

Aa型舰最早出自江川李家山M47，与其共出有铜釜铁斧（图三：16）、铜铍铁矛（图三：17）等铜铁合制器，铁刀、铁剑等铁器，以及大量具有西汉中晚期地方特色的典型器物。且该墓出土四乳日光镜（图三：1）与陕西淳化出土日光镜（图三：2）^[22]形制相似，钮座外四角四出，铭文“见日之光，天下大（明）”书体为缪篆体。故推断Aa型舰在滇池地区最早流行年代约在西汉中晚期。

Ab型舰最早见于江川李家山M57，李家山M49打破M57，M49出土的铜熏炉（图三：26）、漆奁等常见于云南昭通、大关等地东汉早期墓中，因此推断M57年代不晚于东汉早期。且M57出土的星云纹镜（图三：3）与山东临淄所出星云纹镜（图三：4）^[23]相近，内向连弧纹圆形钮座，座外四乳，下有圆座，乳之间有小乳，小乳下有退化“蟠螭”曲线，边缘为内向连弧纹，主要流行于西汉中期。与Ab型舰伴出的还有青铜矛（图三：10）、剑（图三：11）、戈、钺和铜铍铁矛（图三：18），以及釜口有一道箍状弦纹的方釜铜斧（图



图二 舰饰器型演变图



图三 器物分期图

1~9、24、25.铜镜(江川李家山M47:205、淳化铁王公社出土、江川李家山M57:137、临淄LFZF09M277:2、江川李家山M50:37、晋宁石寨山M71:160、淳化铁王公社出土、晋宁石寨山M6:10、洛阳西汉中期墓出土、曲靖八塔台M69:4、洛阳烧沟汉墓M55:7) 10.铜矛(江川李家山M57:199) 11.铜剑(江川李家山M57:25-1) 12.方釜铜斧(江川李家山M57:205) 13.尖叶形铜锄(江川李家山M57:204) 14、15.铜弩机(江川李家山M3:61、福建崇安汉城出土) 16.铜釜铁斧(江川李家山M47:130) 17~19.铜鞮铁矛(江川李家山M47:247-5、M57:50、M51:318-1) 20、22、23.铜柄铁剑(江川李家山M51:111、晋宁石寨山M71:91、江川李家山M3:20) 21.铁剑(江川李家山M51:229) 26.铜熏炉(江川李家山M49:15) 27.立耳铜釜(曲靖八塔台M69:1) 28.铜壶(曲靖八塔台M69:13) 29.铜簋(曲靖八塔台M69:11) 30~33.铜钱(曲靖八塔台M20:2-6、曲靖八塔台M10:1-6、洛阳烧沟汉墓出土、洛阳烧沟汉墓出土)

(1、3、5、10~13、16~21、26分别采自《江川李家山——第二次发掘报告》,第96、95、95、54、69、39、34、159、163、163、163、167、172、92页;2、7分别采自《考古》1983年第9期,第851、852页;4采自《文物》2017年第4期,第71页;6、22分别采自《晋宁石寨山——第五次发掘报告》,第67、96页;8采自《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第73页;9采自《中国铜镜图典》,第239页;14、23分别采自《考古学报》1975年第2期,第119、141页;15采自《考古》1960年第10期,第8页;24、27~31分别采自《曲靖八塔台与横大路》,第80、75、78、79、107、107页;25、32、33分别采自《洛阳烧沟汉墓》,第164、218、218页)

三：12）、上部较宽的尖叶形铜锄（图三：13）等，均是常见于滇池地区西汉中晚期墓葬的典型器物。据此推断滇池地区Ab型觶最早流行年代约在西汉中晚期。

Ba型I式觶最早见于江川李家山M51，M50打破M51。M50出土星云纹镜（图三：5）与M57所出星云纹镜形制近似，主要流行于西汉中晚期。且M51出土有大量铜铁合制器，如铜骹铁矛（图三：19）、铜柄铁剑（图三：20），铁器较少，仅见铁剑（图三：21）、铁鞭，符合滇池地区西汉中期墓葬的典型特征。据此推断滇池地区Ba型I式觶最早流行于西汉中期前后。

Ba型II式觶最早见于晋宁石寨山M71，M71还出土有一面四乳连弧纹星云纹镜（图三：6），其钮座外为星云纹带，缘为十六内向连弧纹，与陕西淳化汉墓所出星云纹镜（图三：7）^[24]相似度极高，主要流行于西汉中期。与其伴出有铜铁合制器，如铜骹铁矛、铜柄铁剑（图三：22）等，除环首铁刀外不见纯铁制器物。据此推断Ba型II式觶最早流行年代约在西汉中期。

Bb型觶最早见于江川李家山M3，与其伴出的有琵琶形铜带钩、百乳镜、铜弩机、铜柄铁剑（图三：23）等，年代上限为西汉中期。其中铜弩机郭、牙、栓、悬刀上皆刻铭“河内工官二百口十口”（图三：14），与《簠斋吉金录》中所收录的“河内工官”弩机刻铭^[25]（图三：15）行文风格相符。1987年西汉长安城内未央宫第三号建筑遗址出土的“南阳工官”弩机^[26]刻铭风格与“河内工官”一致，即先刻工官名，再刻编号数字，绝大部分末尾刻有规格号，其遗址年代下限不晚于王莽末期，而至东汉，弩机的刻铭风格已变为详记皇帝年号、制作官署、监造官吏、匠师姓名、制造年月等。据此推断Bb型觶的流行年代当在西汉中晚期。

Ca型觶最早见于晋宁石寨山M6，M6出土铜华镜（图三：8）一件，铭文“清冶铜华以为镜，昭（照）察衣服观容貌，丝组杂遯以为信，清光兮宜佳人”，形制与河南洛阳西汉中期墓出

土铜镜（图三：9）^[27]相近。且M6出土器物以铜器为主，少见有铁器。据此推断Ca型觶在滇池地区最早流行于西汉中期。

后期为西汉末期至东汉初期，觶饰出土数量锐减，仅与零星马具配件共出，类型简化，除二期晚段及三期早段的Ba型II式、Ca型沿用外，新出现了三期晚段的Cb型觶。

Cb型觶最早见于曲靖八塔台M69，八塔台所出同类型五铢（图三：30、31），“五”字交股弧曲明显，“铢”字左右等高，有下半星，与洛阳烧沟汉墓所出II型五铢（图三：32、33）^[28]同，属宣平时期五铢，M69年代上限不早于西汉晚期。与其伴出的四乳四趾镜（图三：24）与流行于洛阳烧沟东汉初期墓M55所出铜镜（图三：25）^[29]形制相似，且M69中还出土有立耳铜釜（图三：27）、铜壶（图三：28）、铜簋（图三：29）、铜带钩、铁剑、铁环首刀等器物。据此推断M69所出Cb型觶最早流行年代约在西汉末期至东汉初期。

综上所述，滇池地区觶饰的发现始于西汉中期，至西汉中晚期最为盛行，该时期觶饰数量众多，形制多样，常见于大、中型墓中，作为贵族的礼仪用器多与整套马具共出。至西汉末期到东汉初期，觶饰虽在铸造工艺上有所突破，器身较前期更为精巧，扣舌与扣环联结方式越加牢固、灵活，但整体数量锐减，仅作为实用器零星出土。

四 觶饰源流探索

为探究滇池地区觶饰的来源，下文将该地区所出汉代觶饰形制与中原及北方草原地区的同类器展开比较研究。

A型觶扣环整体呈扁圆形，其中Aa型扣舌为死舌，固定在扣环外侧，目前考古发现与其形制相近的扁圆形觶饰最早出土于春秋中晚期的秦国祭祀车马坑（图四：2）^[30]，另外在宁夏固原^[31]、甘肃庆阳（图四：3）^[32]等地区东周西戎文化墓葬中也有发现，Aa型觶仅在扣舌处与其有差异。滇池地区墓葬中常见北方游牧文化因

素的器物,诸如动物纹铜牌饰、卧马纹饰品、立鹿铜铸像、有翼虎银带扣等,推断A型觥扣环形制当是借鉴北方草原文化的扁圆形觥。而A型觥的工艺特征,诸如Aa型觥上的卷云纹纹饰、Ab型觥扣舌的铆铸工艺等当由中原地区汉文化改制而成,北方草原地区至东汉晚期以后才有发现(图四:5)^[33]。

B型觥扣环呈方形或长方形,其形制与山西侯马上马村东周墓葬^[34]、河北邯郸赵王陵(图五:4)^[35]、山东淄博西汉齐王墓(图五:3)^[36]、河北满城汉墓(图五:2)^[37]等所出觥饰形制相似,具有典型的中原地区觥饰的特征。区别在于滇池地区B型觥中存在将扣舌改制为蛇头形的现象,区域文化特征鲜明。故B型觥应是从中原地区传入,仅部分为本地铸造。

C型觥为活舌,双孔,由扣舌、扣环、固定扣舌与革带的横轴三部分组成,从其马蹄形的扣环形制来看,与北方同类器的早期类型相似(图六:1、2)^[38]。而该型觥由死舌发展成活舌,扣舌铆固于横轴穿桩目前最早见于河北满城汉墓(图六:5、6)^[39],其后发展为扣舌中轴套铸,最早见于东汉初期的河南温县烘范窑(图六:8)^[40],东汉末期北方鲜卑族墓地中^[41]亦有发现。故推断C型觥当是在吸收北方游牧文化马蹄形扣环的基础上,结合中原地区的铸造工艺制作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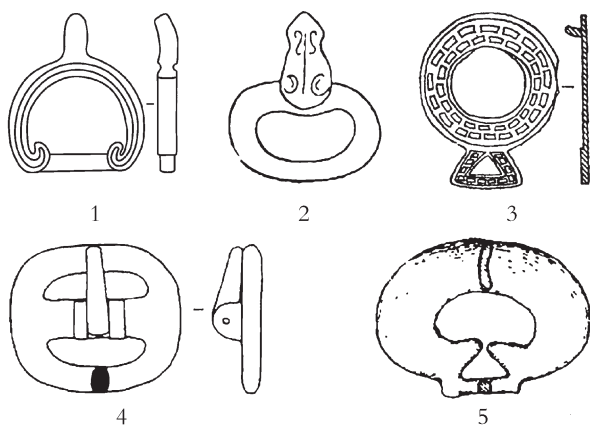
由此结合觥饰的分期、类比可得出以下结论:

1.滇池地区出土的Bb型觥为死舌双孔方形觥,目前未见于其他地区,其出土丰富了觥饰从死舌、单孔向活舌、双孔演变的中间序列。

2.滇池地区前后两期出土觥饰在形制、工艺上所体现的文化因素构成情况有明显区别。总的来看,西汉中晚期中原文化因素与北方草原文化、本土文化因素并行,觥饰类型丰富多样。而至西汉末期到东汉初期,北方

草原文化、本土文化因素在中原文化因素的影响下迅速消亡,觥饰形制趋于规范化,器型仅保有中原地区汉文化的特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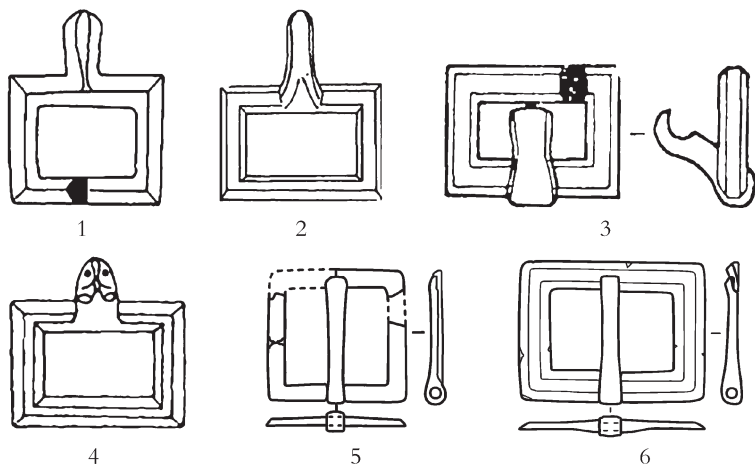
3.中原、北方地区所见各形制觥饰皆有其完整的早晚发展轨迹,而滇池地区觥饰集中出土于西汉中晚期至东汉初期,器型制作工艺成熟,且早晚器型常共见于同一时期,目前在该地区出土



图四 A型觥及其同类器比较

1、4.江川李家山(M47:20、M57:148) 2.凤翔马家庄(K121:1) 3.庆阳城北葬马坑出土 5.大安渔场(M214:3)

(1、4分别采自《江川李家山——第二次发掘报告》,第212、150页;2采自《文物》1985年第2期,第26页;3采自《考古》1988年第9期,第852页;5采自《考古》1975年第6期,第360页)



图五 B型觥及其同类器比较

1.江川李家山(M53:16) 2.满城汉墓(M1:2117) 3.淄博西汉齐王墓随葬坑(K4:34-4) 4.邯郸赵王陵(M1:8) 5、6.晋宁石寨山(M71:203、M71:7)

(1采自《江川李家山——第二次发掘报告》,第150页;2采自《满城汉墓发掘报告》,第205页;3采自《考古学报》1985年第2期,第251页;4采自《考古》1982年第6期,第603页;5、6均采自《晋宁石寨山——第五次发掘报告》,第87页)

的觶饰形制上并未形成一套从死舌向活舌,从单孔向双孔演变的完整类型序列。加之前后两期觶饰皆受中原地区铸造工艺影响,据此推断该地区觶饰多由中原地区传入,作为彰显身份的礼仪用器与车马器成套出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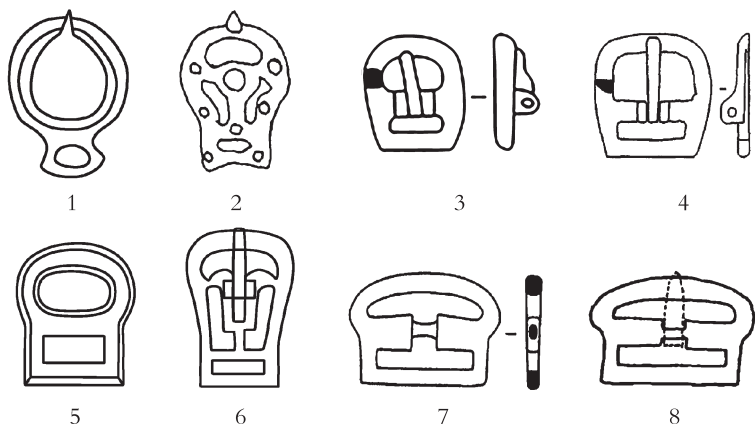
4.本土文化在觶饰传入后便对其形制产生影响,扣舌多呈蛇头状,与北方、中原同类器的扣舌迥异。“蛇崇拜”^[42]常见于滇文化青铜器中,从作为生产工具的斧、铤、凿、锄,到兵器戈、矛、剑^[43]、叉等都存在大量的蛇纹饰或呈现蛇形状,铜觶的扣舌呈蛇头状充分体现出本土文化对铜觶的吸收与改进。但根据目前的出土情况,可见这种改造仅限于构造相对简单的方形觶上,或说明当时该地区自身的铜觶制造工艺仍相对粗糙。

五 觶饰与汉文化“羁縻类型”

觶饰作为滇池地区车马器的一类,主要流行于西汉中期至东汉初期,在这一时期其兴盛到衰退的发展脉络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时期滇池地区“羁縻类型”汉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从觶饰形制的演变来看,前期即西汉中晚期,觶饰类型丰富,在以中原式方形觶占主体的情况下,还主要出土有扁圆形、马蹄形觶,这两类觶扣环形制更接近北方草原地区,且部分觶饰扣舌呈蛇头形,具有滇池地区本土文化的典型特征。三类觶饰在滇池地区同时流行,且均保有其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显示出西汉中晚期汉文化对滇池地区各文化因素的包容性。而到了后期,即西汉末期至东汉初期,汉文化影响程度更为深入,已占据统治地位,使得觶饰整体形制逐渐与中原地区同期流行者趋同。

从觶饰铸造工艺的发展来看,前期中原汉式工艺传入较为迟缓,觶饰器型较为落后,扣舌以死舌、活舌两类并行,部分死舌铜觶的同类器型最早可见于春秋时期。本土对工艺吸收程度较



图六 C型觶及其同类器比较

1. 宁夏中卫狼窝子坑 M5 出土 2. 内蒙古陈巴尔虎旗完工汉墓 (M2 : 21 ①) 3、4. 江川李家山 (M85 : 9、M50 : 44) 5、6. 满城汉墓 (M1 : 2344, M1 : 4356) 7. 曲靖八塔台 (M1 : 6) 8. 温县汉代烘范窑出土 (1 采自《考古》1989 年第 11 期, 第 975 页; 2 采自《考古》1965 年第 6 期, 第 279 页; 3、4 均采自《江川李家山——第二次发掘报告》, 第 150 页; 5、6 分别采自《满城汉墓发掘报告》, 第 205、119 页; 7 采自《曲靖八塔台与横大路》, 第 104 页; 8 采自《文物》1976 年第 9 期, 第 69 页)

低,仅在纹饰刻画、扣舌形状的改制以及扣舌的穿桩铆固上有所体现,未能充分借鉴方形觶先进的套铸工艺。而到了后期,该地区所体现的铸造工艺与中原地区趋于同步,已不见前期较为原始的器型,铜觶扣舌与扣环的联结方式多系套铸而成。随着汉文化影响的加深,先进器型的引入也更为迅速,诸如目前最早可见于东汉初期河南温县烘范窑的器型已能够在同时期滇池地区发现。

从觶饰的出土数量以及共出器物的变化来看,前期觶饰大量出土于滇池地区大、中型墓中,与当卢、衔、轡、节约、马珂等构成一套完整的车马礼器体制,并与大量铜、铁兵器以及铜鼓、贮贝器共出,彰显出该时期滇池地区本土贵族众多,地位尊贵。而至后期,觶饰出土数量锐减,仅作为实用器使用,配套出土铜马具的情况罕见,反映该时期滇池地区本土贵族势力已趋式微。

综上,从滇池地区出土觶饰的整体发展演变可知,前期汉王朝益州郡的设置并未立即切断滇池地区本土青铜文化的发展,该地区本土青铜文化的衰落与汉文化的彻底形成存在一定的时间差。“在公元前109年被汉朝征服之后大约一个世纪的西汉时期,墓葬情境中尽管包含汉式器物,但实质上仍以滇式为主。”^[44]从某种意义上

来讲,益州郡的设置、汉文化的介入推动滇池地区青铜文化达到鼎盛,该时期汉文化与本土青铜文化并行发展的现象当与汉王朝对云贵高原这一边远地区所采取的羁縻统治直接相关^[45]。前期大量出自大、中型墓的铜觶等车马器不仅是本土贵族的身份象征,其保有自身独特形制的风格亦是汉王朝这一怀柔政策的间接佐证。而至后期,觶饰形制与中原器形逐渐趋同、数量锐减以及同期所共出的武器大幅减少,铜鼓、贮贝器消失等现象^[46],体现出随着汉王朝对滇池地区的控制不断加强,地方贵族势力迅速衰弱,已不再保有前期的特权,汉文化跃居社会主流,滇池地区已基本融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之中。

注释:

[1] 郭宝钧著:《殷周车器研究》,第60页,文物出版社,1998年。

[2] [汉]许慎撰:《说文解字》,第98页,中华书局,1963年。

[3]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三《曲礼上》,[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253页,中华书局,1980年。

[4] [清]孙诒让撰,王文锦、陈玉霞点校:《周礼正义》卷七七《冬官考工记·辀人》,第3209页,中华书局,1987年。

[5] [清]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卷四《马蹄》,第330、333页,中华书局,1961年。

[6] 郭宝钧于《殷周车器研究》中最先提出生有钩舌的方策古名为“觶”。在郭氏研究的基础上,笔者依据滇池地区报告中“策”与共出车马器的组合关系及其以扣舌、扣身为主体的结构特征,推断该类器物应与方策相似,是一类用于系固的马饰带扣。但从形制来看,滇池地区所出的“策”扣身除方形外,还呈扁圆形、马蹄形。因其皆为环之有舌者,本文遵循《说文解字》的释名,仍将其称为“觶”,并在后文详细展开文献学论证。

[7] [汉]许慎撰:《说文解字》,第94页。

[8] 周振甫译注:《诗经译注》,第178页,中华书局,2002年。

[9] [晋]郭璞注,[宋]邢昺疏:《尔雅注疏》卷五《释器》,[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599页。

[10] [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许惟贤整理:《说文解字注》,第332页,凤凰出版社,2007年。

[11] [汉]许慎撰:《说文解字》,第94页。

[12] [清]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卷四《胠箝》,第342页。

[13] 《后汉书》志三〇《舆服》,第3674页,中华书局,1965年。

[14] 王国维著:《观堂集林(外二种)》,第548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

[15] 云贵高原地区报告中共收集策(报告中称之为“策”,即本文统称之“觶”,下同)66件,其中赫章可乐报告中只提及策的数量,未对策进行器物描述,无法判断其形制;故能辨别形制的策共计65件,其中包括铜策63件,玉策、铁策各1件,虽三者材质不同,但玉策、铁策功用与铜策相同,且形制特异,因此本文将其一同放入铜策的类型学研究之中,以期得到更为完整的类型序列。

[16] a.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江川李家山古墓群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年第2期;

b.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云南江川县李家山古墓群第二次发掘》,《考古》2001年第12期;

c.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著:《江川李家山——第二次发掘报告》,第150~152页,文物出版社,2007年。

[17] a.云南省博物馆考古发掘工作组:《云南晋宁石寨山古遗址及墓葬》,《考古学报》1956年第1期;

b.云南省博物馆编:《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第98、100页,文物出版社,1959年;

c.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第四次发掘简报》,《考古》1963年第9期;

d.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著:《晋宁石寨山——第五次发掘报告》,第20页,文物出版社,2009年。

[18] 昆明市博物馆、晋宁县文物管理所:《晋宁县金沙山古墓地清理简报》,田怀清、黄德荣主编,大理白族自治州白族文化研究所编:《大理丛书·考古文物篇(卷四)》,第1500、1505页,

- 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9年。
- [19] a.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云南昆明羊甫头墓地发掘简报》,《文物》2001年第4期;
b.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著:《昆明羊甫头墓地》,第515~516页,科学出版社,2005年。
- [20]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曲靖八塔台与横大路》,第104~105页,科学出版社,2003年。
- [21] 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组、贵州省赫章县文化馆:《赫章可乐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6年第2期。
- [22] 淳化县文化馆:《陕西淳化县出土汉代铜镜》,《考古》1983年第9期。
- [23] 王会田:《山东临淄出土汉代铜镜》,《文物》2017年第4期。
- [24] 同[22]。
- [25] a. 杨琮:《“河内工官”的设置及其弩机生产年代考》,《文物》1994年第5期;
b. 方诗铭:《从出土文物看汉代“工官”的一些问题》,上海博物馆集刊编辑委员会编:《上海博物馆集刊——建馆三十周年特辑》总第2期,第136~14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 [2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城工作队:《汉长安城未央宫第三号建筑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9年第1期。
- [27] 孔祥星、刘一曼:《中国铜镜图典》,第239页,文物出版社,1992年。
- [28] 洛阳区考古发掘队:《洛阳烧沟汉墓》,第218页,科学出版社,1959年。
- [29] 洛阳区考古发掘队:《洛阳烧沟汉墓》,第164页。
- [30] 陕西省雍城考古队:《凤翔马家庄一号建筑群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5年第2期。
- [31] 罗丰、韩孔乐:《宁夏固原近年发现的北方系青铜器》,《考古》1990年第5期。
- [32] 庆阳地区博物馆、庆阳县博物馆:《甘肃庆阳城北发现战国时期葬马坑》,《考古》1988年第9期。
- [33] a. 吉林省博物馆文物队、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吉林大安渔场古代墓地》,《考古》1975年第6期;
b. 潘玲:《对部分与鲜卑相关遗存年代的再探讨》,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编:《边疆考古研究》第13辑,第207~226页,科学出版社,2013年。
- [34] 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侯马工作站:《山西侯马上马村东周墓葬》,《考古》1963年第5期。
- [35] 河北省文管处等:《河北邯郸赵王陵》,《考古》1982年第6期。
- [36] 山东省淄博市博物馆:《西汉齐王墓随葬器物坑》,《考古学报》1985年第2期。
- [3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编:《满城汉墓发掘报告》,第204~205页,文物出版社,1980年。
- [38] a. 周兴华:《宁夏中卫县狼窝子坑的青铜短剑墓群》,《考古》1989年第11期;
b.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内蒙古陈巴尔虎旗完工古墓清理简报》,《考古》1965年第6期。
- [3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编:《满城汉墓发掘报告》,第119页。
- [40] 河南省博物馆等:《河南省温县汉代烘范窑发掘简报》,《文物》1976年第9期。
- [41] 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内蒙古扎赉诺尔古墓群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12期。
- [42] 孔德馨:《云南青铜时代之动物纹饰研究》,第39~66页,硕士学位论文,云南大学,2015年。
- [43] 毕洋:《云贵高原战国秦汉时期的青铜剑研究》,第51~57页,硕士学位论文,贵州大学,2017年。
- [44] [美]安赋诗著,赵德云译:《边疆和边界:汉帝国的南部边陲》,四川大学博物馆等编:《南方民族考古》第六辑,第145页,科学出版社,2010年。
- [45] 郑君雷著:《边远以远:云贵高原“羈縻类型”汉文化形成概略》,《边疆考古与民族史论集》,第202~218页,科学出版社,2019年。
- [46] 彭长林著:《云贵高原的青铜时代》,第35~38页,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年。